

监督式民主？¹

约翰·基恩

吴小坤/译 徐佳君/校

本文为我们当代人思考代议和民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指明了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和机制正发生着一种划时代的转向，它列举了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代议制民主逐渐演变为一种“后代议”民主的新型历史形式的说法，并且探究了该演变发生的某些原因。本文认为“历史终结”的视角和浪潮的隐喻（亨廷顿“第三次浪潮”的比喻是最具影响力的）对把握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太过局限不能把握住跨时代的变革，太过约束于表面现象，太多的沉迷于持续性和累积性的数据而无视政治潮流已完全开始了全新的转向。从而提出一种设想，认为现存的民主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潮流的变革，将我们从过去以议会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引向一种有着全然不同框架和机制的民主形式。

很难为它找到一个妥当的名称，更不用说用寥寥数言描述其运作方式和政治影响。这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或许是描述发生在欧洲、南亚，以及除美国、日本、阿根廷和新西兰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一巨大变革的最为贴切的说法。监督式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新型历史形态，指的是“后威斯敏斯特”政治所界定的迅速增长的各种议会外的权力审核机制的变体。² 这些监督机构扎根在“国内”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有帝国、国家和商业组织控制的“跨界”机构中。也正因如此，整个自治政府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对影响公民生活的选举、政党和议会的集中控制都正在减弱。民主不再仅仅意味着选举。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独立的权力监督机构都开始产生切实的影响。这表现在从政者、政党和当政政府因而不再稳坐江山、后顾之忧，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高枕无忧，这些监督机构质疑他们的权威并促使他们改变其议程，有时甚至让他们深感无地自容。

这种潮流会不会成为持续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不论这种新型的民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就像历史上它的两种类型的前身，监督式民主并非历史的必然。它的发生并非必要，但它的确存在了，无论未来是

¹ 本文系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主办“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2008 年 10 月）与会论文译文。

² 形容词“monitory”来自中古时代的“*monitoria*”（词根 *monere* 表示警告），中世纪时以 *monitorie* 的词形被引入英语，并于 15 世纪中叶发展为一个现代英语词汇，表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予以警示，或告诫某人不要实施某种冒犯行为。该词（*monitories*）首先在教会内部使用，指由负有监督职能的主教或教皇或教会法庭发出的一个或多个通知。“monitor”、“*monition*”和“*monitory*”词群很快就被世俗普遍采用。监督者是向他者行为发出告诫的实体。“monitor”这个词用在学校里还可以指帮助教师维持班级秩序的班长。它还可以是一个早期预警装置，就像非洲、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一种蜥蜴一样，它们受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们能够在有鳄鱼出现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后来，“monitor”一词同传播装置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像麦克风或电视机屏幕那样的接收装置，用来检验电子信息传输的内容或质量；在计算机科学语言中，“monitor”可以用来指视频显示或一种检验或控制其他程序的程序。近年来，“to monitor”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动词，用来描述对某物的内容或质量进行系统检验的过程，比如市政检验地方饮用水的污染情况，或科学家检验濒临灭绝的物种，这些与监督式民主的出现并无关系。但这似乎激发了由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提出的“监督式民主”理论（interview, New York City, 4 December 2006）。见舒德森的“民主概念的变迁”，载《MIT 传播论坛》（1998 年 5 月 8 日），完整版本见《良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的历史》（New York 1998），其中借鉴了我对监督式民主的用法。

生存还是消亡，这都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监督式民主的反潮流和功能失调，在我即将出版的《民主之生死存亡》一书中将予以具体论述）。若从其体制框架和内在机制判断，监督式民主无疑是形式最为复杂的民主形式。用拉丁文来说，它就像一种（介于精神和物质或介于相对物之间的）“中间物”（*tertium quid*），一种早期历史实践中基于大会形式的代议民主的未成型的后继形式。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国民”（people）、“公众”（the public）、“公众问责”（public accountability）、“人民”（the people）或“公民”（citizens）这些词汇常常被交替使用，权力审查机构遍地开花。选举、政党和议会从未消失，其重要地位也并没有降低，但是，他们在政治中都基本丧失了其重要地位。民主不再是通过选举、议会和宪法手段简单处理民选政府权力的方式，也不再仅限于领土国家的事宜。民主被描述为“政府应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不应受到限制”（哈耶克）（这一观点在后来受到了批判）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无论是在地方、国家或超国家政府领域中，或是在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的权力制约中，其中一些形态触及日常生活的根基和外延，遍布世界各地，行使权力的人民和组织现在常常受到各种各样议会外机构的公共监督和公共讨论。

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有力的线索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1945 年以来产生的监督民主见证了近 100 个以前的民主党人所闻所未闻的新型权力审核机构。正如我们所将看到的，这些发明创造的捍卫者们常常谈论它们在解决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中的重要性：在这个复杂的大社会中如何促进他们未竟的事业，找到实现少数民主生活的新途径。在这个社会中，大多公民都认为不应轻易信任从政者，政府常常被指责滥用权力或脱离民众，或者仅仅是“不愿急民众之所需，解决民众问题。通过处理此类问题，新的权力审核机构打破了代议制民主下的多数掌控的数量崇拜原则。由于较为自由，因而不用像政党那样处处谨小慎微、说话总是留有余地，一些新生的机构为一直感受到被官方政治排斥在外的少数群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这让他们强烈感受到被关注。一些监督者，如选举委员会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声称“中立”以保证民主的游戏规则。其他一些监督者宣传那些长期受到忽略的问题，或关注那些由选举周期造成的短期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少数者群体由于他们神秘的灵性（*evanescence*）凸显出来，在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搅起一番波澜，然后像游牧民般前行，或者消失在空气之中。

尽管会受到政党、议会和政府的忽视或压制，这些新型的机构还是为人们提供了发表意见和对所关注的生活方式提出看法的空间，它们具有提高公共权力监督水平和质量的综合效果，这对公众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来说都是开创性的，包括领土国家机构“之下”和“之外”的权力关系。难怪新型的权力监督方式已经改变了当代政治话语。它们促使更多关于“权力赋予”、“高能民主”、“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交际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讨论，并且帮助将选举的文化引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对其中很多领域来说都是第一次。监督式民主是调查、焦点小组访谈法、审议投票、在线请愿、受众和顾客投票的年代的产物。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在新的权力监督机制下，投票文化的扩散影响到了政党、从政者和议会，它们的独白常常被打断或是消音。新的权力审核机构通过长于“布道”（美国人有时将其称为“bully pulpits”）的非选举产生的代表，让更多地公民发表意见。监督机构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幅上升，以至于它们直指作为代议制民主核心的“一人、一票、一名代表”的旧规则，取而代之的是，监督式民主的“每个公民、多种兴趣、多种声音、复合投票、复合代表”的新原则。

在试图理解新的权力制约途径时，必须审慎行事；它们并非同出一辙，因此需要仔细检验。新的监督机构并非单纯地是“美国”或“欧洲”或“经合组织(OECD)”或“西方”的产物。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可以全球任何地方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开来。它们覆盖不同的领域，甚至在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次标明了对创新艺术附加值的越来越多的意识，民主的自我更新能力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创新。

监督机制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领域中实现。一些监督机制主要在公民对政府或公民社会实体投入的层面上审核权力；一些则致力于监督和检测所谓的“政策吞吐量” (*policy throughputs*)；还有一些侧重于审核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政策产出 (*policy outputs*)。不少此类机制同时涉及上述三个层面。监督机制也存在不同的规格，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运作，从地方实体到全球网络都有所涉及。

鉴于这种变化，1945年以后迅速产生的新型机构乍看上去像是一个随意堆砌的鹊巢，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些新型机构包括：公民陪审团、区域大会、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和小组座谈会。还有智囊团、协商会议、教项、公共纪念馆、地方社区协商制度和开放式建筑，都提供了信息、咨询和宣传服务，档案和研究设施，以及为建立专业的网络关系提供了机会。公民集会、民主审计、集思广益的会议、利益团体的冲突、反腐败和宪政撒法尔 (Safaris, 因被对其他地方具有检验作用的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使用而著名) 的全球议会联盟也都包括在内。印度的榕树民主 (*banyan democracy*)¹ 也应被纳入其中：铁路法庭、国民法院 (*Lok Adalats*)、公共利益诉讼，以及公民抵制的真力 (*satyagraha*)² 方式。新型机构中还包括消费者检验机构和消费者委员会、在线论坛和聊天室、民主俱乐部、公共和平守护组织、以建立对商业实体和其他公民实体更多的公共问责为目的的峰会和国际监督组织。这些新型机构还延伸至审议选举、会计部、独立的宗教法庭、专家委员会 (比如德国的“五智者”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共“记分卡”——关于公共规划工作、公开协商、博客、公民不良行为的电子记录、以及致力于监督权力滥用的网站 (如英国的 *BullyOnline*) 的黄色卡片和白色记录单。新型机构列表中还包括可自行选择的民意调查 (‘SLOPs’) 以及非官方投票 (比如短信投票)、国际刑事法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全球社会论坛、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采用包括民选部分在内的成文法的倾向。

且慢，因为这些新型机构列表显然并不完整，且容易引起混乱。我们需要思维清晰才能看清这些新型机构共同的特质。监督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承诺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关于各种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信息，并提供外部意见；由于其诉诸于公众，为了防止误解，不能将监督机构同自上而下的暗中监督机制混为一谈，后者是为了在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的名义下谋取私利。就像其概念所描述的那样，监督机制涉及公共准则的审查和执行、防止腐败的道德规范，或者决策者的各种不当行为，这不仅仅局限在民选政府的问题上，而是涉及到整个的权力背景。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新型的监督式民主致力于加强公民表达和意见的多样性，以及更多可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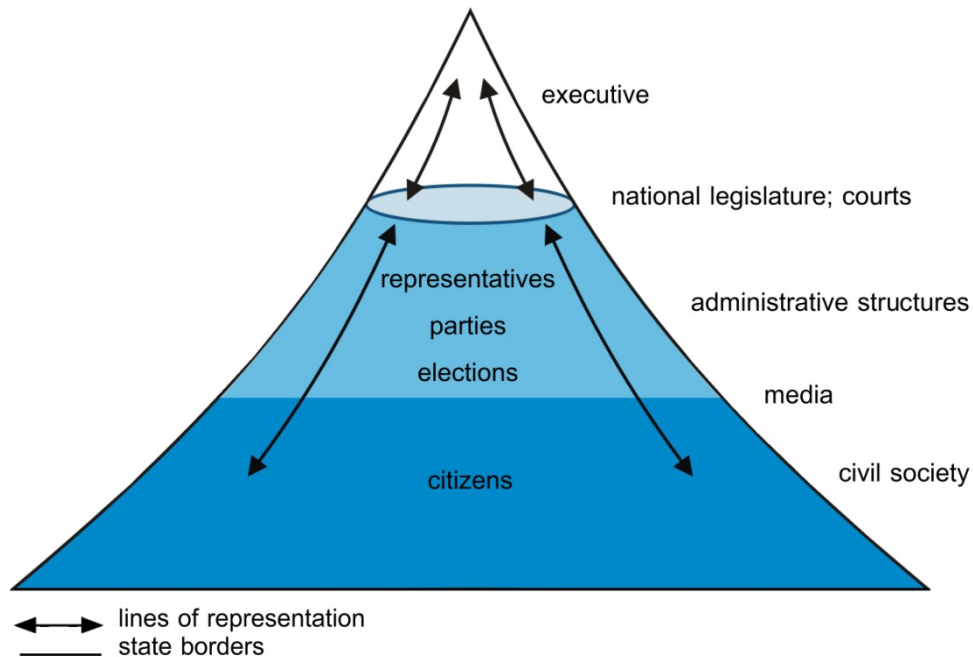
政治地理学

¹ 英国民主体制在印度的沿袭，该体制下，政府分为上院和下院，每5年举行选举。——译者注

² *Satyagraha* 是梵文，意思是“真力”，这是甘地当时为其策略所起的名字，所强调的是“精神的力量”。——译者注

监督式民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会受到审核，审核的标准不仅仅是代议制民主的标准机制，而是由**一系列的非党派、议会外和非选举产生的实体**在领土国家内部和外部予以实施。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公共开放性、公民平等、选举代表——就好像叠加在代议民主上似的。这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后果，然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主体制互动格局的政治地理学变革。

图 1：疆界限制下的代议制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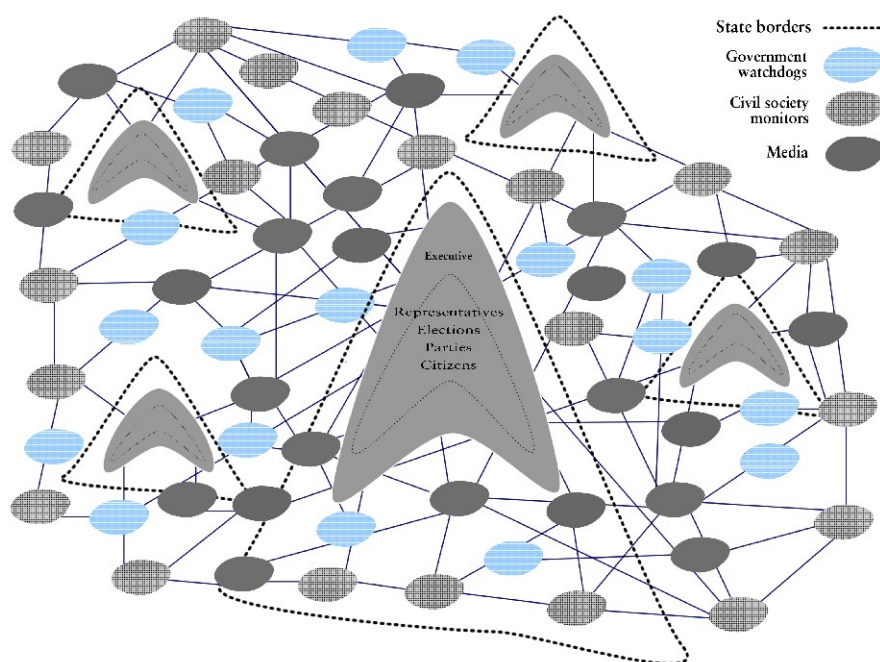
曾几何时，在代议制民主短暂的全盛时期，这种被称为“民主”的东西有着极简的政治地图（图 1）。在任何特定国家的范围内，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民主意味着选举运动和决定某一政党或独立候选人命运的关键日子将随之而来。他（通常是男性），是某个社群里人所共知的人物，一个地方的小店店主，或是一个专家，或是商业或贸易联盟中的某个人物。接下来就是民主的伟大庆典，审议暂停，开始冷静反思，最终结果的暴风雪之前会出现一番宣泄。19 世纪英国小说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80）曾经说过，“宣告世界和平”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狐狸总是对延长家禽的寿命充满热忱”。和她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华尔特·惠特曼（1819–1892）则态度积极地将选举日的功能看作伟大的“选择日”，那是“最有力的场面”、“没有刀枪的斗争”，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或密西西比河甚至间歇泉的约赛米蒂更强大，这是一个所有人的和平选择时代，一个“心灵让生命闪光”的凝滞瞬间。¹ 如果拥有足够的选票，地方代表就能加入一个立法者的小圈子，他们的任务是同政党的政策保持一致、支持或反对政府在立法中使用多数原则、通过法律并审核其执行情况，尽可能实现让大多数代表感到满意的结果。在立法者的工作期满时，反抗也趋于停止。狐狸和家禽都安静下来。又一轮没有

¹ George Eliot, *Felix Holt: The Radical*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6), chapter 5, p. 127; Walt Whitman, 'Election Day, November 1884'

刀枪斗争的伟大选举日到来了。代表们或是退休家中，或是投入到再次选举的旋律之中。

这是一个关于选举职能的简图，但点出了更为复杂的监督式民主的政治地图的不同之处。正如代议制民主是对大会的维护，监督式民主是对立法、政党和选举的维护，其中往往充满激烈的斗争和争议。但这是早期民主形式不断丰富的相互交错、权力监督的机制，如果将放到新的监督式民主环境中就会发现，所发生的一切是难以理解的。

图 2：监督式民主



新的民主需要一种转向，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其政治地理。因此，让我们想象在太空中勾勒一个新型民主的轮廓。我们将发现其对选举、政党和立法的权力审核机制并不集中，不再限定在领土国家的范畴之内，并比对民主的典型假设的教科书更加散乱（见图 2）。监督机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显著的。如果在这些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被称为“跨度”和“幅度”的单位，监督式民主都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民主体系中最为宽广和深刻的。政治地理学的机制，比如审计委员会、公民大会、网络智囊团、地方大会、地区议会、峰会和全球监督机构都无法简单地描述。对政治地理学所镶嵌其中的权力检查和权力争端机制也是如此，这些机制中包括例如公民大会和陪审团、审计和全权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为商业和公民社会体所设置的公共问责的监督组织。

几个误区

监督式民主的新颖性和复杂性都使其易于带来误解。

代表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为拥有权力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大公共问责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草根民主”或“参与民主”或“大众赋权”（popular empowerment），这些比喻都是由于对当代潮流的误解而产生的。

监督式民主并没有导致时代倒退，它并不是出于对获得基于大会形式的民主精神——即如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动乱中学生民主社会（SDS）团体的支持者那样的“人民权力”一的再次努力。许多当代“深刻”或“直接”的民主获胜者说起话来仍带着古希腊的口吻，似乎民主的真正问题在于“普通人通过理性的讨论和由于倾向于将行动与讨论相结合而被授权、做出理智决定的义务和能力”¹。监督式民主则不同，在监督式民主中，所有“人们”或“公民名义下的新的权力审核经验都必然有赖于代表。这些经验通常可以从“人民”中得出其合法性²，但是在消除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鸿沟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却无法理解，就如同公民可以不用他人代表其行事就生活得很好，能够比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弊政下意图错误地交流更好地放映自我和表达自我。

监督式民主在实际上促进了代表性的蓬勃发展。以经常谈到的公民大会为例，在 21 世纪早期，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公民大会选举改革是被谈论最多的案例之一。依托地方立法的公民大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机构，在对全省选举系统的批评监督方面表现出色。大会拥有 161 个成员，包括从 79 个选区中随机选出的每省一名男性代表和一名女性代表，外加两个原住公民代表，以及一名该省的立法议会代表。公民大会的代表并非选举产生，而是抽签决定。相比之下，希腊人相信抽签的结果是由神灵决定的，大会成员由计算机随机产生，从一个能够反映英国哥伦比亚公民的年龄、性别和地域组成的团体中选出。公民大会财政独立，它在政党体系之外运作，同立法机关、游说团体和记者保持一定距离。其职责在于作为一个所有英国哥伦比亚公民临时代表的非民选机构行事。

选举

选举的重要性和地位变更带来的另一个误解，它使许多人无法看到监督式民主的奇特之处。自 1945 年以来，只有十几种民主形式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政党民主取得了一个大逆转，以至于像福山和亨廷顿之类的学者认为，除了代议制民主的数量大大增长外，一切都没怎么变化。我们应当原谅他们：20 世纪上半叶，随着民主的大范围崩溃和几近灭亡，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对其政府管理机构日渐熟悉却成为不争的事实。代议制下基于政党的传统形式并没有消亡。成千上万的人越来越习惯于政党间的竞争、定期选举、限期执政和公民有权集会和发表意见以使他们的立法和行政获知意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有法律约束的领土国家中实践的。在如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马耳他和博茨瓦纳等地，选举民主的机制首次扎根，而在其他语境中，尤其是那些选举式民主已经较为完善的地区，已经开始对民主机制进行某些修正，比如在政党中引入初选机制、紧

¹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Thinking about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5

²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将集会式民主形式下的“人民”看作是代表履行职责的一个裁判，那么监督式民主所展示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主权”的神话。监督式民主的动态结构通常被用作对无限制的“人民”崇拜，或是称作“demolatory”的东西设置障碍。监督式民主宣称，世界是由许多的 *demoi* 组成的，特定的社会是由志趣相异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组成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看法一致。可以说，监督式民主公开揭露的民主形式下，“人民主权”就像是一部浮夸的小说，它最多是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一种参照：一部有用的政治小说。曾几何时，“人民”被作为一种监督原则，就像德国前联邦法庭法官 Dieter Grimm 所阐释的：“需要虚构的‘民众’来提醒最终的合法性并非源自那些法律制定者，这是罕见的情况。”民主需要公共权力，但是他们同样需要援引“人民”这一虚构概念来对公共权力的执行加以限制：“归属问题（*Zurechnungsobjekt*）”本身并没有行为能力，但却在问责意义上带来了民主的必要性。（interview, Berlin, 23 November 2006）。

缩竞选筹款和开支、改变选举规则、改善残疾公民的投票设施，以及禁止改投他党¹（2007年巴西高级法庭通过的一项决议）。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亨廷顿和其他一些学者将近几十年的代议制民主的壮观重生看作是“第三次浪潮”就似乎是不无道理的了。在教科书上，民主以一些新的历史形态出现，通常被称作“代议的”、“自由的”或“议会的”民主。一些如定期选举、多党竞争和公民对立法赞成或不赞成的公共表达权都是民主生活中人们熟悉的内容。关于谁有权投票、在何种情况下等问题不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想一下那些新出现的法律和政治争议，其中很多是关于谁拥有电子选举系统和软件生产商所提供的不可靠的电子选举设备软件的）。事实上，一些人，比如罪犯，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另一些人，包括流浪者、语言弱势者、缺乏文化和技能的残疾人，都因无记名投票选举而处于不利地位；还有一些选区中如妇女、年轻人等，他们的意见或者得到很少的表达，或者根本得不到表达。

争取以更开放的方式提高选举和立法代表质量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民主的整个建构的确开始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这个过程本身很缓慢。对民主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民主不再是（如同古希腊城邦中所述那样的）一群男性公民通过大会来自我管理的同义词，也不是受到大多数立法意愿所引导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的代名词；民主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权力随时随地都受到审查和制衡，没有被管理者或他们代表的一致同意，没有人能够获得统治权。重新界定民主的一个症候是选举监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民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新的或遭受战乱破坏的政治格局下建立选举开始系统地受到来自外部观察者的监督。而这一经验却被公认为是比较老套的，1857年首先在普鲁士、法国、英国、俄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使用，他们的代表一同监督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²的公民投票。但是在新的环境下，监督式的选举在全球范围内都被看作是一种更加有力和公开的方法。所有国家都期待一种“公平与公开”的方式，该方式被认为是消除暴力、恐吓、投票舞弊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腐化的方式，包括世界上民主力度最大的美国，在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欧安组织（OSCE）³观察者们也首次发挥了作用。

公民社会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派系斗争曾将造成社会层面的分裂，从而失去中心。随着选举文化的扩张，以及在许多情况下非民选代表的成倍增长，一系列新的问题衍生出来。折磨代议制民主已久的老问题“谁在什么时候可以被赋予选举权”，在“人民在何处被赋予选举权、为谁选举和通过哪种代表方式”的新问题下变得更加复杂，至今也没有合适的答案。

只有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备受关注的公共监督事宜才会被认为是非政治的。代议制民主时代（就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见证了不断增长的自组团体和

¹ 禁止改投他党（banning party hopping）。1992年，巴西最高法院曾根据联邦宪法中关于自由结社的原则宣布禁止改投他党的法规违宪。政府曾一度鼓励改换党派身份，但后来却因选举的不稳定而不堪重负。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可以背叛一个政党而改投他党，那么他也可以背叛下一个。沙巴进步党也支持立法禁止改投他党。--译者注。

² 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摩尔达维亚位于东欧，连接东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从14世纪起到1859年都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存在。1860年以后，西摩尔达维亚同瓦拉几亚合并，组成现在的罗马尼亚。现在，西摩尔达维亚仍属于罗马尼亚，东摩尔达维亚属于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而它的北部和东南部都归于乌克兰境内。--译者注。

³ 欧安组织（OSC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安全组织，其主要职责包括武器控制、人权、出版自由和公平选举。欧安组织同时也是联合国宪章下的专案组织，关涉早期预警、冲突控制、危机管理和战后重建等。--译者注。

系统，如工人对产业的控制，对政府权力施加影响力的过程。这些系统中在 20 世纪上半叶后几乎都没能苟延残喘，这一情况使得监督式民主的出现显得更加突兀。这一巨大的变化在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兴趣中十分明显。该词条第一次使用是在 18 世纪的欧洲，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皆知的民主惯用词。这一变化还表现在各种政府政策领域中公共监督的强趋势，其公共关注涉及从对儿童的虐待和法律权利、同锻炼和饮食相关的日常习惯，到居民保护计划的发展和提升民主以确保如纳米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未来走向是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基础而受到监管。对新形式的公民参与和选举代表的培育实践已经开始渗入市场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被称为“*Mitbestimmung*”¹的职工参与决定系统。

在如健康和社会保障等的公共服务机构中，对批评权和选举权实施的可能性和需求都在上升，对这一问题的意识也日渐丰富。代表选举经验甚至拓展到了大范围的全球组织之中。一个范例是国际奥委会（IOC）：它曾经是一个边缘的男士私人俱乐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丑闻揭发类新闻的目标。其间丑闻接踵而至，公共叫嚣紧随其后。在压力和相当大的困难下，奥委会开始将监督机制运用于自身的问题。一些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到 2002 年奥委会的 115 个增选委员中仅有 12 位女性，当年，没有一位女性进入 66 位新增委员提名。但是，也有些情况是发生了变化。奥委会成员到参选城市的访问活动被令行禁止了。一个奥委会伦理委员会和一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了。奥委会的收入和支出报告首次得到公开出版。奥委会会议向媒体开放。一个所谓提名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以更加公正地决定奥委会成员资格，该资格八年内有效，每 8 年重新选举。奥运会运动员被赋予向奥委会直荐代表的权利。奥委会成员的年龄上限从 80 岁降至 70 岁。政府代表的规则首次被用于奥委会内部运作，至少在文本上是这个样子。奥委会提名成员每年至少要开一次会。不同于联合国大会，奥委会的参会成员被看作他们各自的国家的代表，而非奥委会内部的代表。奥委会会议是后国民大会的某种产物，其职能在于选出任期 8 年的主席，可连任一次，连任期 4 年。会议还负责确定有权的执行局的成员身份，以无记名的方式选出，要拥有过半数的选票，任期四年。执行局作为奥委会的内部组织，最终负责管理奥委会的全部事宜，包括推荐新的奥委会成员，以及对既有成员和奥委会的整体运作进行监督。

守门人

公民社会在权力监督机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似乎在于确定那个被詹姆斯·麦迪逊称为“自由政府法”的东西：任何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自由的，除非它能够管理一个能够同时对政府加以约束的社会。该法律（《联邦党人文集》第 51 条）诱使一些人错误地得出政府很难对其权力进行自我检查的结论。事实并非如此。经验表明，在监督式民主时代，政府有时会为了市民的利益进行自我约束。

因此，政府“守门”机构就变得有意义了。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通过半独立于政府的代理机构对政府进行公共检察（值得注意的是，检察（scrutiny）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捡垃圾”，它来自拉丁语的 *scrutari*，表示从垃圾，即 *scruta* 中寻找）。检察机制是对政府代表和法官权力监督角色的补充，尽管他们通常并不认可这一目的。这一机制通常通过民选政府的普遍权威表现出来，比如通过部长级会议完成其责任。在实践中，却常常会事与愿违。尤其是当政府的检察机关

¹ 德国的《职工参与决定法》（*Mitbestimmungsgesetz*）是德国产业和公司政策的基础。该法出台于 1974 年，其中规定在员工超过 500 人的公司中，管理委员会中要有一半的成员来自工人代表。——译者注。

受到立法的保护，资源和管理都不缺时，它们就开始个谋私利了。有陈旧的王室委员会作为先例，监察政府廉洁的公共咨询和公共审计（这些都是代议制民主时代的发明）等新的检察机制对民选代表可能会有的权力滥用现象进行了检查和平衡。它们常常被看作是提高政府效率和效益的途径，比如通过让政府决议更好地“为人所知”来提高作为“利益持有者”的公民对政治机构的公共信任度。这一过程显示出一个双重悖论。政府的检察机制常常由政府设立，而后又在比如腐败和执法标准问题上难以控制其运作；同时这一新机制也会带来民主和权力检查的实际效果，尽管它们通常由非选举产生并且对选举周期横加干涉的官员组成。

独立的“整体系统”在许多国家都扮演了重要的公众形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好的范本。伴随着对政客和警察，有时同商业和团伙犯罪相关的反复曝光，监督机构的建立为公共部门注入了新鲜血液。其目标是通过选举代表或指派官员，严厉打击不法行为，同时对警务系统中松散和形同虚设的投诉系统加以指摘，这一系统之于民主政府就像刀刃之于刀。疑虑还在于选出的部长们不愿意对敏感的警务事宜公开审查。在20世纪70年代，澳洲南部的两个皇家委员会倡导建立了第一个警务投诉管理局（1985）。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以昆士兰刑事司法委员会（后来的犯罪和不当行为委员会）的建立而达到高潮。成立于1990年，作为反腐败和犯罪侦查部门，委员会负有在公共部门内曝光腐败事件、从事犯罪研究、搜集组织犯罪证据和跟踪并发现犯罪进程的职责。

跨境民主？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对“跨境”和“国际”民主的整体理解存在严重偏见。该种偏见可以追溯至地域限制的代议制民主时代，并且，当今几乎所有在民主领域内的重要学者都在为其假设的真理辩护。有趣的是，监督式民主开始正视并突破这种偏见，其权力监督的网格模式有力地粉碎了“国内”和“国外”、“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差异。民主同包括商业和大学在内的其他类型的机构一样，其“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过程也在所难免。这是对监督式民主机制内部动态关系的另一种说法，指的是整体系统的每个部分既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又作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存在状态。若要更抽象一点，在监督式民主系统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部分和整体。其组成单元可以被更好地描述为次整体，即“holons”——这是匈牙利学者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著名的杜撰词；这些“次整体”是一些能够同时自我审视和自我主张的实体，它们在一个多边系统中相互作用，并扮演不同的角色。

峰会（summit）这一二十世纪中叶的重要发明将上述体系进一步普及。一个奇特的事实是，summit一词首先应用在大权力政治之中，作为政府和国家首脑或外交官参加的非正式的特设会议，该类会议最早是对付希特勒的苏联、美国、英国的脆弱联盟会议。也有人指出，“summit”一词最早用来描述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会晤中的所谓“百分比协议”，当时丘吉尔和斯大林正在估测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影响。这个词有一个奇怪的数学词源（或许是斯大林令人费解的英语中的一个断句，“加起来”（sum it））。而后，该词很快就演变成一个登山者的词条。丘吉尔本人长期以来主张国际关系中的高层非正式战略会晤，他主张“峰会外交”和“首脑会谈”的好处，这一观点在1955年日内瓦峰会中得到普及，在那次会议里，“summit”这一同攀登有关的词汇被首次用于描绘冷战后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政治首脑的会晤。

从二战末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著名的维也纳峰会（1961年6月3日—5日），大约共有100多次这样的峰会，且每次都以差不多的方式进行。这些会议都关注

冷战动态，并且都具有全球性和两极化的明显特征。无论是否被用作树敌或结友的工具，早期的峰会都有很强的预见性。规则是，没有政治家愿意冒着被羞辱的危险，因此，大家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就像欧洲君主的古老仪式一般，这些峰会都达到了加强自上而下事务在人们心中概念的作用，例如这个世界是如何掌握在少数一群人受众的。

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就是，峰会变成了争夺代议权力的领地。峰会本身变成了一种监督机制。峰会的功能和涵义的转变明显地反映在李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高层会晤中，包括 1986 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会晤，那次会晤在没有征得北约和其他一些组织同意的前提下，提出了废止弹道导弹和一切核武器的政策。自那时起，峰会就开始被广泛用作领导人对政府机构做出“反弹”迫使其转变政策。这对起到了督促政府政务公开的作用，让人们更广泛地意识到，政府允许来自内外的不同意见的存在。

这种峰会的增长披着隐秘且华丽的外衣，它开始吸引众多记者的注意，这些记者急于报道权力核心之外的故事和人物。自 1985 年 5 月的 Bonn G7 峰会开始，其年会都为公民社会组织和抗议者提供了表达对各种公共事务看法的机会，比如国际贸易和恐怖主义的急剧增长和跨境犯罪。直接的结果是将权力持有者推向了难辞其咎的代表位置。在 198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柏林会晤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那次有组织的抗议者高达 8 万；随后，在一些峰会及其预备会中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世界儿童峰会（1990 年）、世界土地峰会（1992 年）、世界人权大会（1993 年）和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最为壮观的一次或许就是 2005 年 7 月那次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峰会通过新的方式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利益代表，这种新的方式被称为呼吁政治领导人“书写穷人的历史”的八项“完整意识”网络。

政治效能

有种观点认为，在权力审核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国家和企业仍然握有决定在现实世界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怎样得到的核心权力。1945 年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公共事务，却证明这并非是必要的，这些事务涉及：妇女和少数群体公民权、美国对越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核武器、减少贫穷和全球变暖问题，这些议题不是由政党、选举、立法和政府所提出的，而是由与以党派为基础的权威代表机制所并行的，且常常是相悖的权力监督网所提出的。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强大的公民权运动，也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的一些创造性的策略，如抵制公车、改良协会、合作委员会、静坐、静跪、不得保释、宣誓、自由乘骑、公民学校、自由歌唱、选举登记旅行、模拟选举，都是监督机构能够通过强迫唤起人们对意外事故的意识，对既存权力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时需要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时会令权力弱势者取得意外的胜利。这一运动带来了两项深具历史意义的立法。1964 年 7 月 2 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公民权利法案》，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教育和雇佣方面的种族歧视加以禁止。1965 年 8 月 6 日，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了《选举权法案》，废除了文化水平测试、投票税和其他一些对选举权的限制，包括在国家和个人层面的选举中持续使用上述手段来对美籍非洲人进行歧视的联邦政府干预行为。通过这类法案，监督式民主的运作更加有力。它向人们证实，权力弱者也拥有改变某些事情的权力，这些改变会首先在家庭、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公共范畴内发生，继而延展到整个美国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版图之中。

为什么要监督式民主？

我们已经分析了关于监督式民主大致轮廓和主要机制的一些误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监督式民主的不期而至？

上述各种权力监督机构背后的动机显然是非常复杂的，就像在民主历史的初期阶段，对民主的普及是困难且危险的。但确定的是：新的民主形式必有其原因和条件。监督式民主并非单细胞事务，而是由许多因素所诱发产生的。变化通常在管理圈内部发生分裂时产生，这时，有公民的勇气和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者的决心就会进一步发生作用。个人的野心、不正当行为、权力游戏和对更加有效或廉价政府（急于在政策失败或失意时将责任归咎他者的政府）的诉求，在其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保守意识、激进要求、政治地理的考虑，以及市场压力的外在作用。建立“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地区层面上培育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技能）的机会，以及获得权力的诱惑或政府服务以外的财政增长都促使一些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寻求更加有力的监督机制。意料之外的后果和十足的好运气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托克维尔所述的因素也即变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公民和他们代表中具有感染力的、能够消除某种不满的信仰令其他不满被表达出来并得到解决。

所有这些压力共同将现行的民主推向监督式民主。但是，在这个新时代中，最重要的动机却是：战争。在民主的历史中，随机和有组织的暴力、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常常成为新的民主机制的助产士。在 20 世纪前半叶，这个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多杀戮记载的年代，这一规则显然适用。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可怕的残酷行为动摇了旧的安全架构，对权力大规模的攻势和推动，以及带来革命的公众愤怒的发泄，通常被冠之以“人民”的头衔，这些都与代议民主相悖。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有效地扭曲和滥用了民主的性质，而这被理解为人民主权。那些制度下的领导人常常会声称“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受雇于这些制度的人于是着手对无论是他们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的言论进行封锁和残杀。西方民主被贬低为议会紧张和得过且过，是自由主义的困惑、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军事怯懦。进入 20 世纪，民主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屈服。它看起来就像是群龙无首、死气沉沉、残缺不全且注定失败的。1941 年，当罗斯福总统呼吁“让民主的火焰从蛮夷的屏障中闪现出来”¹时，当无数的反对者得出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才更有前途这样完全相反的意见的时，那时，世界上仅存有 11 种选举民主形式了。²

那些愚蠢僵化的头脑显然也很有可能做出点什么，包括战争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以及由战争所催生的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大的灾难令很多人明白，旧的民主模式是多么的天真，在这样的惯例下，人们因为统治者为其生活和财产提供保护而臣服于他们的政府。那一毁灭性的动荡时期证实了这一“保护—服从模式”难以运作，在许多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长期协议被打破，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自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时代直至 19 世纪的民主批判，即“人民”的独裁。20 世纪上半叶所

¹ 1941 年 3 月 15 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对白宫新闻记者协会的讲话。

² 仅存的议会民主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科斯塔利加、新西兰、瑞士、瑞典、英国、美国和乌拉圭。芬兰尽管在战时特殊情况下采用选举团的形式进行总统选举，也应被包含在内。

发生的事件证明独裁的真正根源在于长于操纵“人民”的恶的领导人。这样，问题就不在于通常所谓的暴民了。统治本身才是问题的所在。

统治问题是个核心问题，但却在 1945 年以后的一批民主政治反思中极少有人研究¹。监督式民主的智慧根源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文学、神学领域他们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不同于如阿尔贝·加缪，胡克，托马斯曼，雅克·马利丹等以往的智者，最为突出的是，莱因霍德·尼布尔的《光明的儿童和黑暗的儿童》（1945）很快就成为经典。这些作者都表达了对战争和极权主义中夹缝生存下来的大会民主难逃厄运的担忧，他们认为议会民主形式只是被暂判死缓，很快就将濒临灭亡（Camus）。他们认同近期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能够被完全破坏，它的机制可能被民主的敌人冠之以“人民主权”的称号而滥用，民主得以成立的多元自由和政治平等被破坏。深受其扰的作者们呼吁为代议制民主的弊病寻求良药，并开始不再乐观。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但是所有人都支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的精神和机制要能够有力地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权力。美国神学家尼布尔（1892—1971）提出了一个在这一线中改造和重塑民主的最有力的例子，他后来获得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最受推崇的人”的荣誉称号。“权力失控的危险常年危及民主社会的价值”，他写道，“但是现代民主需要一种更加现实的哲学和神学基础，不仅是为了预测和理解它所面临的危险，并且要给它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得出了著名的结论：“人类维护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类对正义的倾向却使民主尤为必要。”²

对政治罪行的思考无疑有助于激发监督式民主的最显著特征：民主和人权的结合，以及为维护人权而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组织、网络和运动的攀升。这一结合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但其当代启示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两大政治宣言中得以窥见：《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后者可以被认为是以 4500 万人的牺牲、严重的破坏和精神灾难，以及与如巴基斯坦和印度、柏林封锁和巴勒斯坦未解决的问题等政治困难紧密相关的越来越多的战后紧张局势为代价的。起草于 1947—48 年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似乎仅仅是个幌子，并不触及问题核心。其序言中谈到“人格尊严”和“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平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呼吁公民社会和各国政府都将人权作为一个重要事项来对待，其实践促成了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形成了监督式民主。今天，网络化的组织，如人权观察、阿加汗发展网（Aga Khan Development Network）、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经常处理广泛的人权事务，包括酷刑，童兵，虐待妇女，宗教，学术和文学的自由等。他们的工作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技巧性的宣传对人权提供支撑。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对政府和公民良知的鞭策，他们解决困扰代

¹二战后的几年内对民主未来的思考在全球语境中开拓了一些新的思维路径。具体见：Thomas Mann, *Goeth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1949); Jacques Maritain,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a typewritten manuscript prepared as an addres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29th December 1949); Harold Laski et.al.,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London 1946);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hicago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utumn 1946 issues of *Combat*]);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 (London 1945); Pope Pius XII, *Democracy and Peace* (London 1945); Sidney Hook, 'What Exactly Do We Mean By "Democracy"?' ,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47, pp. 10ff; and A.D. Lindsay, *Democracy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1945).

²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 (London 1945), p. vi.

议制民主的一个基本问题：谁决定谁是“人民”？很多人权组织和网络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

信息大量传播

人权与民主的结合和很多监督机构都在 1945 年以后兴起，这表明战争不会总是政治家的游戏、神父的喜悦、律师的笑话和受雇杀手的买卖，有时它也为公民和机构建设者提供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机会。但如果全面战争是监督式民主最主要的催化剂，那么毋庸置疑，传播媒介是使其后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如果不把新媒介机制下的权力和冲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监督式民主的可信性便难以明朗。如此来看：以集会为基础的民主属于口语主导的时代，一些写在草纸和石头上的法律对其加以支撑，信息以徒步或骑驴、骑马的方式传播。代议制民主源自印刷文化时代，以书籍、小册子、报纸、电报和邮件作为传播的途径，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早期，尤其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的时代，就陷入了危机。相反，监督式民主同多媒体渗透型增长的社会关系紧密，这种社会的权力结构不断被信息大量传播下的新媒介系统中的监督机构所“销蚀”。

代议制民主时代，印刷文化和有限的视听媒介与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代议制民主时代所不同的是，监督式民主见证了持续的公众监督和权力纠纷，似乎没有什么政府或社会生活内的组织或领导人能够免于政治难题。很多因素共同导致了此类变化，包括新闻所引以为豪的基于事实的“客观性”下降，以及视听率、销售等因素驱动下的商业新闻的广告般的吸引注意力风格的兴起。如电子存储、严格的频道间距、新的频率分配、卫星直播、数字调谐和先进的压缩技术等技术因素也非常重要。技术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有线和卫星结合的计算机通信，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该技术在几乎所有日益商业化的媒介领域中激发了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创新。这一新生的媒介系统没有任何历史先驱。以其核心组成之一的互联网为特征，它是一个媒介设施相互重叠和相互连接的全新的世界系统，整合了文本、声音、图像，并使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多个用户终端能够在任何时间，无论是实时地还是延时地，在模块化的全球网络中实现信息的获取和交流。

权力审查事务中的所有机构都严重依赖这些媒介新发明，如果新的大量传播系统突然自爆了，监督式民主便时不久矣。监督式民主和计算机化的媒介网络像是一对双生儿。这么说并非落入假设陷阱，其中计算机相关的传播网络预示着一个新型的乌托邦世界，一个电子前沿的“虚拟社区”的狂欢，一场令所有公民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平等地使用和获取所有媒介的“网络革命”。信息大量传播的新时代实际上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自我矛盾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穷人和富人的传播权力鸿沟被进一步拉大，似乎没有必要让穷人成为传者或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很穷，没有钱打电话，只有少数人能够使用互联网。媒介富有者和媒介贫穷者之间的分歧折磨着整个监督式民主，这违背了监督式民主所阐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平等地交流意见的基本原则，并不时地将经过民选的和未经民选的代表拖入困境。

然而，尽管存在矛盾和不尽人意之处，信息大量传播系统内也有一些新的且重要的事情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生活”和“隐私”的范畴，以及对“私”权力的处理和运作已被提上日程。上几代人可能会为这一民主形式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和强度之大而感到震惊。随着照相机快门一按或某一内置开关一闪，私人范

畴可以被瞬间变作公共范畴。所有的一切，从卧室到会议室，从官场到战场，都可能被媒体抓来使用。由于那些未经民选的自认作为公众代表的记者们所讲述的故事，这个年代下私人的文本信息会被公开于众，婚姻的不忠会被揭发出来，政府官员会被迫辞职。这个年代，索尼的手提式摄像机是记者们的必备工具，他们将候选人生活的各个细节发布到视频网站和博客上去。这个年代，视频画面揭露出战争区的士兵侮辱妇女、恐吓儿童、折磨无知村民的情况。在信息大量传播的年代，政客、非民选代表和名人的私生活，他们的恋情、聚会、健康、用药习惯、纷争和离异，都成为千百万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谈话节目、博客和其他一些媒介行为，“普通人可以无休止地公开发表他们个人的恐惧、喜悦、希望和希冀。由于媒体公司授权观众通过掌声、电话或互联网为自己所喜爱的明星投票，这种模拟投票甚至使一些人很幸运地成为媒体明星。

在那些报道风格关心“突发事件”和意外多于事实真相的热血记者的帮助下，信息大量传播直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人们很容易抱怨新的新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喜欢猎奇，关注不良事件，并受到那些说故事不应受到事实阻碍的新闻工作室的怂恿。认为这种方式喜欢不安分，吸收各种信息源，填补新闻漏洞，在监督式民主的年代，新闻永远都不会睡去，并由于太过注意个性而忽略时效性的文本，常常令人眩晕。认为新式的新闻十分程式化，并且很快就会让人生厌，它喜欢同权力和政府简报合作。但是，这些指责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那些不顾一切的热血新闻有助于帮助旧的乌托邦在权力之外得以生存，有助于“信息自由”，有助于“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更大“透明性”。未经检查的权力仍然在公民的思想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一点毫不奇怪。由于新式新闻和新型的监督机构，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公众反对腐败和罪行司空见惯。似乎丑闻会没完没了，甚至有时丑闻会像地震一样在整个政府脚下隆隆作响。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一些丑闻成了传奇，就像由不经意地发现秘密设在华盛顿的水门酒店中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引起的公众哗然，随后该事件滚雪球一样扩大，发展成为著名的水门事件，以权力弹劾和尼克松总统 1974 年 8 月的辞职告终。在大西洋彼岸，主要的丑闻事件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政治喧嚣，那次喧嚣由政府审计员的报告所引发，报告称社会党高级官员经营 Filesa 和时代出口公司，他们收取了约 10 亿比塞塔的咨询费用，但从未上报（这被成为 Filesa 事件）。然后意大利警察和被称为“bribesville”的政治腐败的判定系统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净手运动”导致了許多政党的消失，一些政客和产业领导者在被曝光后自杀。法国外交部长辞职，法国总统在电视上承认 1985 年 7 月的谋杀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和炸毁他们的“彩虹勇士号”船的事件是法国特工组织所为。那次事件中，该船带领一个游艇船队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环礁进行核试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 21 世纪初以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弥天大谎为借口，对其进行军事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病毒性政治

这样那样的一些“门”丑闻不断提醒我们监督式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权力持有者从未在操控人们的问题上少下功夫，因此，肮脏的政治交易给权力蒙上阴影并将其丢到公众面前，这始终是最基本的重要问题。没有人会开玩笑地认为有着这么多权力审查机构的监督式民主是个游乐场——一个所有公民及其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机会平等的天堂。然而，监督式民主和信息大量传播的结合不会产生

持久通量，即一种由各不相同且相互作用的人和机构的复杂结合、长期推拉、冻胀和紧张、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关系所带来的无休止的躁动。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常常在界定和决定谁在何时、如何、得到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但是被代表者利用各种权利检查设备优势，监督他们的代表，有时会取得意外的成功。因此，监督式民主机制就不能仅仅用从代议制民主时代继承来的简单隐喻来描述。如果用议会的“人民主权”，或“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或“压力团体”、政党和政府间的扭打来描绘这一民主形式就太过简单了。从政治几何学的角度来看，监督式民主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由规模各异和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监督实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该网络的形成要归功于信息大量传播、谁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什么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对权力执行者的公众责任。监督式民主中存在大量的冲突。政治并没有消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整体趋势中有一些全新的东西。从民主源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集会形式来看，民主总是使权力习惯、权力偏见和权力等级发生分化。它让人们拥有能够平等地塑造和重塑他们生活的感觉，并且也经常给世界带来一些骚动。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不同规模的监督机构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权力审查使得监督式民主成为最有活力、最具生机的民主形式。它甚至拥有像“民主审计网”和“透明国际”那样，专门针对权力审查机制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民利益的问题提供公共评估的机构。还有一些机构专门在广泛的层面上质疑政府工作，从他们的人权纪录、能源生产计划，到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等。私营公司的服务和产品、他们的投资计划、如何对待雇员、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同样受到拷问。各种各样的监督者、指导者和呼吁者始终各尽其职，对权力持有者施加更多的公众问责。因此，权力者不断感到无能为力。

当运作良好时，监督机制会有许多积极的影响，从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开、提醒政府的不当决定，到公共审查的充实和普及，以及通过有效的参与制度赋予公民和民选代表更大的权力。当然，权力监督也可能会没有效果，或产生负面效果。运动可能会目标不明确或定位错误，玩弄权力者可能会狡猾地找到漏洞得以脱罪，或者对反对意见视而不见。曾几何时，很多公民，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工人、父母、社区居民、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觉得很多组织的监督策略太过小心翼翼，或令人费解，或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尽管存在这些弱点，监督式民主政治机制的整体感觉同代议制民主时代大相径庭。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政治有着确切的“病毒”特征。监督式民主机制所引起的权力纷争，沿着非常规的路径，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使用手机、留言板、消息组、维基和博客的群体，有时会克服各种困难，令公共官员、党派和议会、甚至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权力监督机构，像“人权观察”或“大赦国际”时常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它们也通常从支持者网络中获得帮助。让我们想一想当前引人关注的公共纷争：关于一些消息的框架、评论和重要性的讨论被大大小小的权力监督组织重新设置。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那种“病毒、网络”的格结构是非常典型且无一例外的。它对旧的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制定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机构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陷入权力监督机构的“粘性”网络中，而这些监督机构即便在远程条件下也能够命中目标，令它们自食其果。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专横权力不再能够舒服地藏于隐私的面具之后；任何地方的权力关系都受制于在媒体帮助下的各种规模的公共组织，以前冠以“隐私”之名的事情再无藏身之地。当然，这种权力的变性常常是杂乱无章的，并时常裹

着炒作的外衣。但是摘除权力的面具却与监督式民主的权力监督精神产生共鸣。一些人会抱怨它所带来的影响，如“信息泛滥”，但是从监督式民主的信息大量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却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有着炒作的嫌疑，新的媒介系统毕竟刺激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它引导他们多元主义的意识，并让他们在何时、如何和为何传播上接受更大的责任。孩子们擦洗过背部和耳根，穿着睡袍和家人坐在一起，收听或收看收音机或电视里的节目，那种以广播作为大众娱乐的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时代结束了。同样，成千上万的人们挤在集权主义的权力的阴影下，巧妙地发现策划过的广播节目或煽情的电影表演的时光也一去不返了。

相反，信息渗透的民主鼓励人们质疑权力的可靠性。所有王权下的人和机构并不希望看到这一转变。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人们要学会留意权力和他们的代表，他们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公民于是开始为自己着想，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整体意识变得更加敏锐，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偶然的。信息大量传播和监督机构共同促进了大众权力观念的“完形开关”。客观存在“现实”的形而上学观念受到削弱，权力之上的固有的“事实真相”推定也被削弱。人们亲眼所见与所听到的像“皇帝的新衣”般的虚假界限被打破。“真实”包括“真实的”权力，通常被理解和解释为“制造的真实”，以及将某种解释强加给他人的权力。

诚然，没有什么会神奇地自己变成这样。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传播是伪饰、协商、妥协和权利冲突的持久主题，一言概之，是个政治问题。因此，信息大量传播不会自动保证监督式民主精神或机制的胜利。信息渗透社会能够并且已经给民主带来了不良影响。比如，在某些领域，媒介渗透分散了公民对一些事件的注意力。人们被期待成为对公共事务保持关注，而不仅仅看到自己家里和邻居事务的好公民，但是却有一些人发现，面对媒体大量的信息，很难集中注意力。太过丰富的信息带来了困惑。比如，选民曾经对黄金时段电视上播放的选举广告感到厌烦，以至于回复以冷淡。他们丝毫不受感染，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起居室，换频道，或静音，并深深地叹气；这些，对候选人来说，还是不知道为好。这离更让人担忧的事只有几步之遥，那就是不去思考的漠然文化的滥觞。监督式民主一定依靠信息的大量传播，但其更离经叛道的影响之一，是鼓励个人像鸵鸟一样坚持把头埋在故作无知的沙堆里以逃避这个复杂的世界，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浮于时尚潮流的漩涡之中，具体表现为：想法发生改变、言行举止轻率、拥护甚至为对手喝彩、不接纳真实、落入一些人谨慎地称之为“废话”（bullshit）的怀中。

愚蠢的幻想、玩世不恭的态度和不满的情绪是对公民、以及他们民选的和非民选代表的最大诱惑。监督式民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未来将会给出我们答案。

翻译：吴小坤，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校对：徐佳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方式：ichliebendich@126.com